

# 移民治理研究的地方轉向

## ——兼論兩岸城市經驗

● 林顯明

### 一 傳統與主流移民理論的觀點

當前許多傳統與主流的移民理論皆發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1950至60年代間，受到戰爭的影響，為數眾多的歐洲人民，特別是在戰前的中產階級選擇移民海外，藉以尋求更為安全和穩定的生活環境，以及追求更好的生活。對此，戰後所興起的移民浪潮，為學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研究和觀察機會，促成移民理論在戰後的快速發展<sup>①</sup>。其中，以解釋母國(home country)與接待國社會之宏觀政治、經濟等環境條件的優劣因素如何影響到移民個體之國際遷徙決策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最具代表性。該理論透過檢視移民母國與接待國之間的正因子(+)，即拉力因子)和負因子(-，即推力因子)的權衡與比較，進一步梳理出影響移民個體是否遷徙之因素。若移民母國之負因子多於正因子、而移民接待國之正因子多於負因子時，那麼人們即有較大的動機與可能性選擇離開其原本所居住的國家，動身移居到海外生活<sup>②</sup>。

與此同時，戰後大量歐洲民眾移民後的生活也成為了當時學者所關注和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其中，植基於早期歐洲白人移民至美國之經驗的「古典同化理論」(classical assimilation theory)即發展於1950年代；此一理論觀點將移民視為一個線性的過程，關注所謂的「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s)，即人們選擇了離開母國，並在接待國社會中重新建構出全新的生活模式。古典同化理論較傾向以失根(uprooted)的觀點來看待移民個體與母國的關係，認為隨著個人移民至接待國社會的時間愈長，不僅將會逐漸切斷與母國的聯繫，亦會更為積極地學習接待國社會之主流文化和價值觀，並以追求融入與同化於接待國社會為最終目標<sup>③</sup>。

然而，具線性觀點的古典同化理論在1980年代末期後，在網際網絡與信息及通訊設備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受到愈來愈多的挑戰，特別是快速發展的數位通訊工具與即時通訊軟體等，使得移民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想要與居住在母國的家人進行溝通與聯繫時，即可立即和快捷地滿足需求。對此，新的移民理論應運而生，此即為1990年代後迅速發展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理論。該理論中一個重要的觀點為「跨國社會空間」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這裏所指的「空間」並非一種物理的空間；相反，其所指的是移民透過頻繁往來與溝通於母國和接待國之間所創造出來的一種跨越國家邊界限制的社會性和想像性空間。因此，在跨國主義的理論觀點中，移民並不需要在母國與接待國兩者之間做出選擇，也不需要因為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放棄與母國的關係與聯繫，跨國主義論者常以「腳踏兩地」(making “their feet in two societies”)來描述當前移民真實的日常生活經驗<sup>④</sup>。

從這些討論不難發現，傳統移民理論主要以國家和宏觀的角度來探討移民議題以及他們的生活狀況；這些理論的分析標的及思考邏輯的出發點，無不是從國家或宏觀整體社會的角度去分析移民個體之國際遷徙決策行為或是移民在接待國社會的融入程度等。然而，上述理論被論者批評存在「方法論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謬誤，方法論國族主義所持之「國家容器」(national container)論，不僅過於簡化了國家底下不同族群、宗教、階級、家庭結構以及地方(local)和城市(city)脈絡的差異，且傾向直觀地認為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人們應具備類似乃至於一致的社會文化特徵。然而，這樣的謬誤不僅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生活於其中的真實世界，亦進一步影響了研究者在進行歸納時所得出的結論。對此，有愈來愈多的論者認為，需盡力避免方法論國族主義所可能造成的觀點偏誤，應將研究視角放置在國家和宏觀層次外的更為多元的層次上<sup>⑤</sup>。

順此可知，上述的理論皆存在着一個問題，亦即地方與城市(以下簡稱「地方」)等在地脈絡的視角並未被呈現，特別是移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構築在不同之地方脈絡與城市空間中，而一地和一城不一樣的政經制度安排、社會環境，以及對於移民者的接受程度差異等，在在都會影響移民個人和群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類經驗和感受。另外，傳統移民理論似乎也隱含了地方在移民治理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僅是一種被動且只能接受國家和中央政府(以下簡稱「中央政府」)之施政規劃與政策安排的配合者而已。為了補足前述理論之不足，千禧年後，有更多研究者開始關注地方在移民治理中的角色，甚至主張移民研究在千禧年後已進入到一個「地方轉向」(local turn)的新階段<sup>⑥</sup>。

本文將依序討論數個和移民治理中的地方轉向有關的議題，包括當前歐美主要移民接待國因着大量國際移民人口(以下簡稱「移民人口」)移入，而導致在許多地方所出現之「少數為多數」(majority minority)和「超級多樣性」(super-diversity)城市的發展現象、移民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能動性議題、中國大陸和台灣兩地不同城市之移民治理的相關機制與經驗的初探性比較。文章最後對當前地方政府在國際移民治理之經驗進行理論性的反思，並就移民治理之地方轉向的未來研究方向以及相關的理論應用層面提供看法與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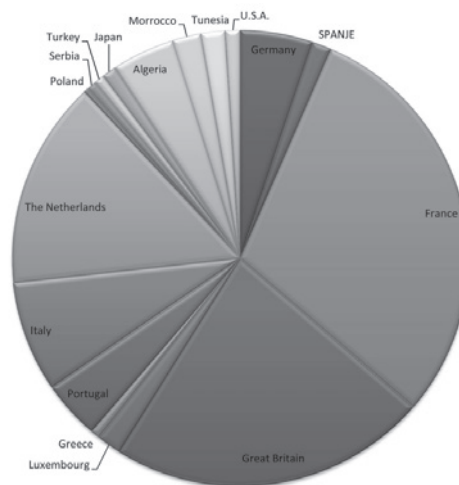
## 二 歐美「少數為多數」及「超級多樣性」城市的發展

在地方轉向的討論中，歐美社會「少數為多數」和「超級多樣性」城市的發展是當前移民研究在探討地方於移民治理中所扮演之角色時兩個較為明顯的

發展現象和關注重點。例如西歐國家比利時，全國總人口數約有1,150萬人，而移民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一成左右，亦即約100餘萬人；然而，若僅從國家層次的角度來看待移民人口與治理議題，並無法確切地反映出國際移民對於比利時這一接待國，特別是地方層級所帶來的改變。但若將視角放置在地方層級，即可清楚地了解到移民對於地方在人口結構或治理上的影響。以首都布魯塞爾為例，它是一個西歐著名的少數為多數城市，在這個城市當中，移民和少數族裔的人口總數不僅已超越了本地人口數，且人口佔比已超過一半以上。截至2020年底，該城市人口約200萬人，然其中約七成的城市居民具有移民背景，亦即他們若不是第一代移民就是移民的後裔，使得布魯塞爾成為了比利時第一個少數為多數城市<sup>㉞</sup>。

然而，國際移民所帶來之一地人口結構改變不僅發生在首都城市，亦出現於比利時許多鄉村地區與城鎮。論者馬利 (Ico Maly) 即以位於比利時東北邊之臨海渡假小鎮奧斯坦德 (Ostend) 為例，藉以比較1990年代與2010年代二十多年間，大量移民人口的移入如何改變這個人口僅約八萬的濱海城鎮。圖1呈現了1990年代奧斯坦德移民人口之國籍分布情形，當時的奧斯坦德接收了來自十七個不同國家的移民，英國和法國移民佔半數。然而，該鎮的移民人口結構在經過二十年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圖2呈現了奧斯坦德2011年移民人口之國籍分布情形，給人的第一印象即是國籍變得非常多樣。根據馬利的研究，到了2012年，奧斯坦德移民人口之國籍數大幅增長至130個國家<sup>㉟</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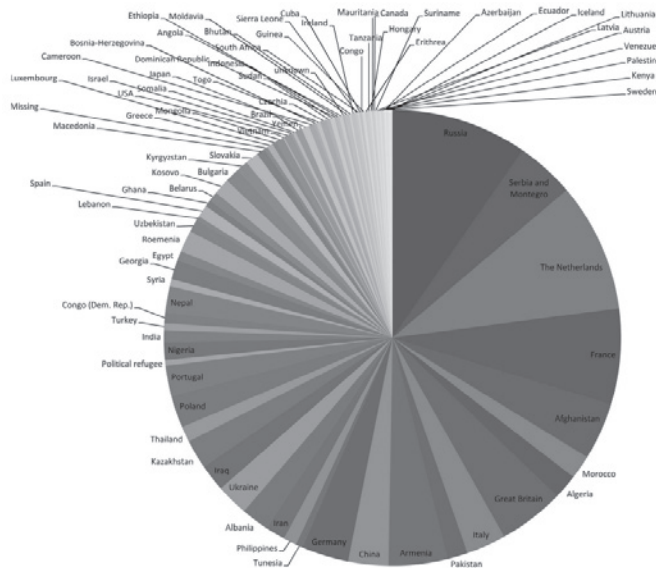
圖1 1990年奧斯坦德移民人口之國籍分布



圖片來源：Ico Maly, "Detecting Social Changes in Times of Superdiversity: An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 of Ostend in Belgiu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2, no. 5 (2016): 710.

截至2009年，在奧斯坦德每四位新生兒中就有一位是由非比利時籍父母親所誕下。2011年，14.54%的奧斯坦德居民擁有移民身份或者為國際移民的後代，而這個數字到了2014年進一步增長至17.6%，由此可見移民人口已顯著地改變了奧斯坦德之人口組成。而因移民人口大量移入所產生的改變，不僅具體顯現在奧斯坦德的人口結構裏，如何應對與治理移民人口增加所引起

圖2 2011年奧斯坦德移民人口之國籍分布



圖片來源：Ico Maly, “Detecting Social Changes in Times of Superdiversity”, 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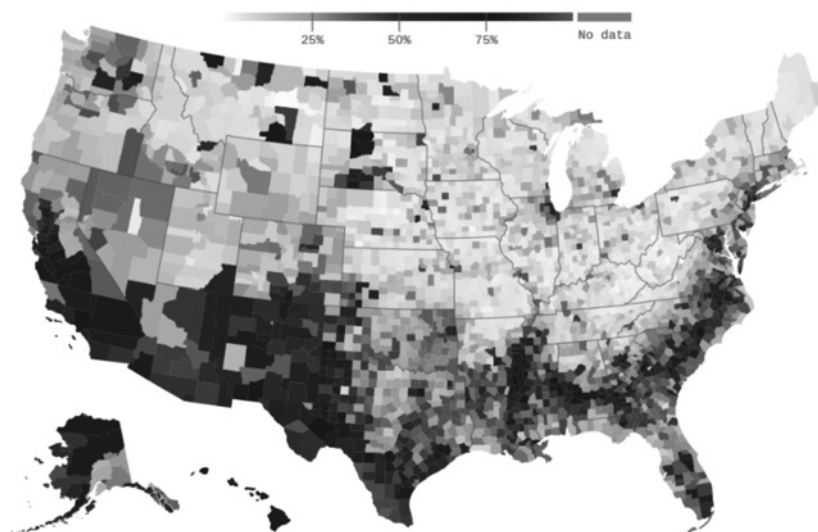
各方面的多樣性議題，在在都為這個小鎮的地方政府帶來種族、語言、宗教、教育、法律、就業等許多新的挑戰<sup>⑩</sup>。

另外，帕克 (Burak Pak) 和米烏斯 (Bruno Meeus) 對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與第二大自治市根特之移民人口與相關特徵進行了深入比較。他們在比較居住在兩地之國際移民群體主要從事的行業及提供的服務後發現，兩地移民從事的行業有所不同，布魯塞爾移民所從事的行業較為多元，包括服飾業、餐飲業、珠寶業、房地產業以及美妝業；而根特移民所從事的行業則大量集中在餐飲業，其他相關行業的就業情形分布則較不明顯。由此可知，國際移民在一地或一城所能參與之經濟活動類型，可能會因為當地社會環境脈絡的不同而有所影響。布魯塞爾不僅是比利時的國家首都，亦是國際間重要的鑽石交易市場，很自然地發展出較根特更為多元的城市產業類型<sup>⑪</sup>。而帕克和米烏斯的發現呼應了「移民創業」(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理論中「混合鑲嵌」(mixed embeddedness) 的觀點，亦即國際移民在一地或一城的經濟活動之選擇並不完全掌握在移民本身；相反，當地之產業環境與經濟系統會影響移民在不同城市間所能投身之經濟活動類型<sup>⑫</sup>。

移民、少數族裔和非本地人口在地方範圍中成為多數的發展趨勢並非僅發生在歐洲。以美國為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的調查，截至2018年，美國共有293個城市與地區已符合少數為多數城市的標準，亦即非白人 (non-white) 居民之人口數超越了50%<sup>⑬</sup>。基特 (Stef W. Kight) 的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 (圖3)。當原來之本地人口變成了少數群體時，那麼到底是移民群體要適應或融入原本的主流社會，還是作為少數之本地居民要學習如何適應或尊重由移民人口增加所導致之社會文化結構的改變？這些新興的社會文化現象，不僅挑戰了傳統和主流的移民理論，也真實地影響和衝擊了第



圖3 2017年美國地方非白人人口比例



圖片來源：Stef W. Kight, "America's Majority Minority Future" (29 April 2019), [www.axios.com/when-american-minorities-become-the-majority-d8b3ee00-e4f3-4993-8481-93a290fdb057.html](http://www.axios.com/when-american-minorities-become-the-majority-d8b3ee00-e4f3-4993-8481-93a290fdb057.html).

一線面對移民群體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sup>⑬</sup>。另外，移民人口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不同地方所面臨的移民治理議題是多樣且不同的，對此，若僅是從國家和宏觀的層次去檢視與觀察移民治理議題，可能無法讓人真實和精確地了解移民人口對於不同地方的影響與改變。在此情況下，為了補足國家和宏觀研究層次的不足，我們應從地方的角度來檢視移民治理議題的變動性與多樣性特徵，方能更有效且適切地了解移民人口遷徙如何對地方社會帶來各個層面的影響。

移民對於地方結構的改變不僅發生在人口的層面上，亦發生在地方不同的社會領域中，沃托維克(Steven Vertovec)提出了超級多樣性的理論概念，藉以了解城市的層級如何因為大量移民人口的移入進而促使各個社會層面出現多樣化的現象<sup>⑭</sup>。沃托維克以著名之少數為多數城市倫敦為例，透過梳理移民人口結構的變化後發現，傳統上用來了解移民群體與主流群體的「二分法」概念，已無法清楚地呈現移民人口如何促使一地和一城經歷多樣化的變遷過程；他的研究指出，倫敦共接納了來自全世界逾180個國家和地區的移民群體，因此，在倫敦這個城市有機會與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或地區的人們相遇。他也強調，雖然倫敦接納了廣大和來源不同的移民人口，但這些移民群體在倫敦內部的居住與分布情形並不平均，例如布倫特(Brent)自治區擁有全倫敦比例最高的移民人口，而其他擁有較高移民比例之城市區域包括紐漢(Newham)、西敏寺(Westminster)以及依令(Ealing)等。由此可知，城市內部不同地區居住的移民人口與分布比例亦有所不同。

另外，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沃托維克發現，當前每天在倫敦這個城市中被使用的語言有超過三百種以上，且移民人口也帶來了眾多不一樣的宗教信仰，並吸引了逾數十種的信仰組織在倫敦扎根。然而，他也從倫敦的例

子看到，傳統上以短期移民和長期移民來認識國際移民群體與治理議題的視角有不足之處，因為人們移民至倫敦的途徑已愈來愈多元，包括移民工作者、國際學生、配偶與家庭移民、尋求庇護者與難民，以及非法或無證件之移民等，亦有隨着全球化和國際商業活動發展而到來的各類型短期或長期之外派工作者與各式高技術和低技術移工等。沃托維克所提出的超級多樣性概念即在提醒研究者，這些發生在地方層次之多樣化 (diversification) 和複雜化 (complexity) 過程，在在都突出了地方視角在移民治理中的重要性，因為一地和一城當局對於其內部多樣性程度之掌握與理解能力，不僅將會影響公共服務提供的品質，也會進一步影響個別地方是否能達成善治 (good governance) 和永續發展的長遠社會目標。

### 三 城市在移民治理中的角色與能動性

順着上述的討論可知，當前許多國際級的城市，乃至於一國內部的二線城市或者鄉村地區，都有可能正在經歷着大量移民人口移入所造成的人口結構、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的快速變遷，以及多樣化和複雜化的變化過程。對此，格布哈特 (Dirk Gebhardt) 的研究即從鄰近性 (proximity)、能力 (competencies) 以及政治本體論 (ontologies of the political) 等三個方面來分析與說明為甚麼地方層級對於理解國際移民與移民治理議題至關重要<sup>⑩</sup>。

從鄰近性來看，地方政府最先感受到移民人口大量移入所帶來的種種改變，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多樣化與複雜化的變化一開始亦都是先發生在地方層級而非整體的國家層次，因此若僅是從國家或宏觀的角度去理解移民相關議題，箇中複雜性、多元性和動態性的程度即很有可能被忽略或低估。相較之下，從地方層級去理解與探討這些議題，才能較全面和精準地掌握與評估相關社會與政經環境變化，對於個體之微觀、城市之中觀以及國家之宏觀等面向所可能構成之多層次的複合性影響<sup>⑪</sup>。

從能力的角度來看，在移民治理的領域和範圍內，中央政府發揮的功能主要在於制訂和執行「硬性政策」(hard policies)，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國家邊境政策的擬訂與治理、國境內人口的管控等涉及主權意涵的政策領域；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的，則是與移民群體之權利和義務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各類型「軟性認可政策」(soft recognition policies)，包括各類社會福利保障的申請工作、住房政策、適應與融入課程的提供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等。也因為地方政府所主管的移民治理政策着重在軟性領域，所以地方政府成為了處理移民需求的第一線，需應對移民就各類申請政策可能產生之不滿與對政府部門的抱怨。

最後，若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所擁有的不同政治本體論來看，亦可進一步發現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領域的重要性。如上所述，中央政府所關注的政策領域多聚焦在與國家主權和政治權威性分配等議題，而較少會直接接觸到個別的政策利害關係人；相反，地方政府則主要關注如何回應與滿足城市居民對於不同政策議題的喜好和直接反應，因此相較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在移民治理的領域中面對較為直接的壓力，不斷回應不同移民群體在日常生活不同層次與範疇的需求和政策偏好<sup>①</sup>。

那麼，從研究者的角度，該如何完整和有系統地掌握與研究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能動性呢？希爾曼 (Felicitas Hillmann) 和彭靜蓮嘗試將城市在移民治理中之多元性角色與能動性進行歸納，並提出了「物理結構」(physical structure)、「社會經濟結構與政策」(socio-economic texture, policies) 以及「象徵與代表性」(symbolics and representation) 等三個面向的思考與分析架構 (表 1)。

表 1 城市移民治理結構與面向

城市的面向	物理結構	社會經濟結構與政策	象徵與代表性
城市再生的動力	環境營造	社會文化的結構	文化與形象
由上而下的政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興建與移民接待相關的基礎建設 (抵達建築)</li> <li>• 具標誌性的建築</li> <li>• 難民中心</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針對移民或弱勢群體所提出之各式政策舉措 (住屋、就業輔導、教育、健康、信息及通訊技術、科技)</li> <li>• 歡迎中心</li> <li>• 移民辦公室</li> <li>• 移民整合概念</li> <li>• 跨文化周等推廣活動</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多樣性視野</li> <li>• 歡迎手冊製作</li> <li>• 城市公民權推廣活動</li> <li>• 多樣性指標設立與競賽</li> </ul>
移民實踐與由下而上的能動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移民經濟活動</li> <li>• 跨文化組織、文化節慶、體育競賽與活動</li> <li>• 移民與文化創意產業、移民旅遊導覽與藝術創作等</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節慶與遊行</li> <li>• 公開的祈願活動與跨宗教對話</li> <li>• 多元化社會運動、飲食文化融合、移民群體社交媒體使用 (如博客)</li> </ul>

資料來源：Felicitas Hillmann and Ching Lin Pang, "Migration-led Regeneration: On How Cities Become More Unequal with Mixed Population Flows",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2, no. 1 (2020): vii.

從希爾曼和彭靜蓮的觀點來看，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議題中的角色，很明顯並非僅是配合中央政府被動地執行政策而已；相反，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的過程中，至少在物理結構的建設，以及在社會經濟結構與政策、象徵與代表性等議題上皆發揮了積極作用，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致力和移民群體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一方面能更容易獲取移民群體對地方政府在預算和政策上的支持，另一方面透過和諧互動關係的建立，進一步爭取移民群體在接待國社會中被接受、被代表與被看見的可能性<sup>②</sup>。

尤有甚者，勃魯蓋爾 (Ilona van Breugel) 以荷蘭的城市在移民治理中的角色與能動性為例，將城市之移民治理分成四個類型，包括「積極的多元文化」(proactive pluralist) 城市、「積極的單一文化」(proactive monist) 城市、「回應的鑲嵌性」(reactive embedded) 城市和「回應的單一領域」(reactive one-domain) 城市等<sup>⑩</sup>。勃魯蓋爾和斯科爾滕 (Peter Scholten) 進一步提出，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展現的能動性並非受到城市的大小與人口的多寡所影響，因此學界認為大城市較傾向多元文化主義而小城市較封閉與排外的既有刻板印象，可能是有所偏誤的。對此，他們強調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中的角色與能動性以及相關表現是多元的，且可能會隨着時間改變而有所不同。即便是同一個國家內的不同城市在面對移民治理議題時，亦有可能會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與策略選擇。因此，在實際的移民治理中並沒有一個融合性或普世性的治理模型存在；相反，每一個地方所面臨的移民治理議題都是獨特且富含脈絡性的。當研究者要進行城市間的比較時，必須考量各個城市的脈絡及其所面臨的移民治理問題<sup>⑪</sup>。

#### 四 中國大陸國際移民治理經驗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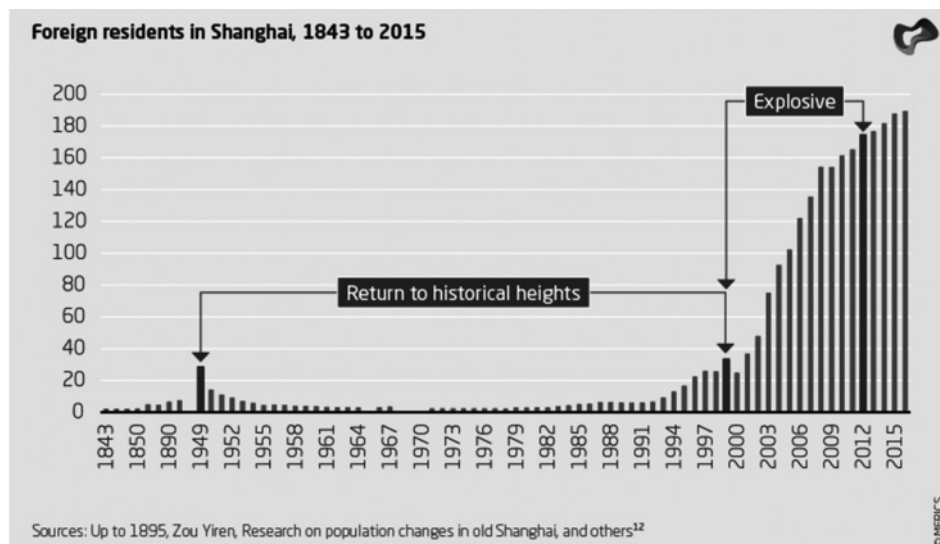
在討論了歐美國家的城市治理經驗後，筆者欲針對中國大陸兩個主要城市——上海、廣州的國際移民治理經驗進行初步的探析與討論。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政至1978年宣布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政府既不允許大陸人民移民海外，亦對外籍人士進入大陸持消極和保守的態度；1980年代至千禧年間，由於大陸境內外籍人口數量有限，移民治理議題尚未被投以足夠的關注。

然而這樣的情形隨着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以及其後實行一系列經濟改革開放政策而有了明顯的改變。這主要是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首先，2001年後中國快速之經濟成長及其所提供給世界產業鏈之廣大的市場與低廉的勞動力，成功地吸引了為數眾多的外資和跨國企業赴大陸投資，伴隨着這些投資而來的即是大量外國企業的專業經理人、行政人員展開短期或長期的定居和與工作相關之遷徙活動。其次，隨着中國經濟改革和十數年來高速的經濟發展，不僅進一步改變了中國在全球產業與供應鏈的位置，也使得部分城市隨着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漸成為吸引外籍人士定居與工作的熱門區域，其中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及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即是兩個主要的外籍人士居住熱區。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對於居住在大陸境內的外籍人士數量之調查，一直遲至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才開始。然而，根據中國於2020年所進行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約有140萬的外籍人士（境外人員；如不包括港澳台人士，則有約85萬人）居住在大陸境內，若以中國約14億的總人口數相較，居住在大陸之外籍人士不足總人口數的0.1%，佔比非常有限。但若將相關人口資料的檢視層次從宏觀的總人口數，轉變成地方的角度，則會發現居住在大陸的外籍人士之分布情形有着高度的不均衡性和地區集中性特



圖4 外籍人士居住在上海的情形，1843至2015年



圖片來源：Frank N. Pieke, "How Immigration Is Shaping Chinese Society" (27 November 2019), <https://merics.org/en/report/how-immigration-shaping-chinese-society>.

徵，集中於北京、上海、廣州等主要城市。以上海為例，2020年外籍人士的居住人數就佔了外籍人口總數的11%，亦即約16萬外籍人士居住在上海<sup>21</sup>。

圖4所示之上海外籍人士居住人數變化呼應了上述看法，上海的外籍人士居住數量一直要到千禧年左右才回復到1949年中共建政時的高峰，但自2000年以後即有了很顯著的增長。而上海的外籍人口數自2013年達到17.6萬人高峰後，至今依然維持在超過16萬人左右，也進一步促使上海成為中國首批擁有全球型城市格局的地方。在過去，上海主要的外籍群體包括日本人、美國人、韓國人、法國人和歐洲人等，這些外籍人士之所以來到上海，很大的原因是跟隨國際企業赴華投資與經商，因此上海傳統上的外籍群體從事的產業類別以高技術生產或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為主。然而，隨着中國與上海經濟的發展和在全球生產和供應鏈位置的變化，使得上海的外籍群體有着愈來愈多樣化的趨勢。例如，從2005至2015年的十年間，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與韓國人所佔整體上海外籍群體之比例已從44%降低至31%，相對地，同一時期來自於其他非傳統（主要指非西方）國家之外籍群體的比例則從15%大幅上升至28%。換句話說，目前在上海外籍群體的來源與國籍背景愈益多樣化，而上海社會也正在經歷伴隨而來的更多跨文化接觸與協商的機會與挑戰<sup>22</sup>。

另外，一部分研究者關注位於廣東省、住有大量非洲移民的廣州。在中國歷史上，廣州一直以來都扮演着中國與外界聯繫的角色；作為南方地區重要的通商口岸，廣州不僅為唐宋「海上絲路」戰略的起點，更是早在1685年就成為了中國當時開放和外國進行通商的四個口岸城市之一<sup>23</sup>。除了外交、歷史因素外，中共建政以來最早從非洲國家來大陸的群體主要是國際學生，1950年代喀麥隆等國已派出學生來華；1980年代共有四十三個非洲國家選送了2,245位非洲學生赴大陸求學與唸書，其中一部分即安排在廣州就讀<sup>24</sup>。2011年一年內，約有二萬名非洲學生在華留學，其中即有四十九個非洲國家選送了1,832位留

學生赴廣州求學與唸書。當然，部分學生在完成學業之後返回母國，但亦有為數不少的學生選擇留在大陸，藉以尋求更多的發展機會<sup>25</sup>。然而，若僅從非洲國際學生在廣州的人數來看，並無法真切地了解到非洲移民群體在廣州當前的發展狀況。

若從常住人口與非常住人口的標準來看，即可更清楚地了解到為甚麼在過去十數年間廣州的部分地區（例如越秀區小北路一帶）會被稱為「巧克力城」（chocolate city）。從常住人口來看，據統計，2019年約有1.5萬來自非洲各國的國際移民居住在廣州，然而大部分學者認為，這樣的統計可能遠低於實際的情形與數字。若從非常住人口的角度來看，僅是2012年一年間，共計有超過10萬名來自亞撒哈拉地區（Sub-Saharan Africa）的非洲人來到廣州。在他們當中或許並不是所有人都會長時間住在廣州，但有許多人是頻繁往返於母國和廣州之間的「跨國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nts），而他們來到廣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購買和批發小商品、鞋類和成衣產品，帶回母國進行販售，亦即他們大部分是為了從事跨境貿易而來。若進一步地從2019年的統計數據來看，該年度約有300萬外籍人士經由廣州進入大陸，其中約36萬人來自非洲國家，許多人會選擇待在廣州從事小商品買賣與跨境貿易活動<sup>26</sup>。

過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廣州的小北路一帶地區因有大量非洲移民人口與小商品買賣商人聚集而受到媒體和學術界的關注。1998年後，大批非洲跨境商人來到廣州從事小商品等買賣，並在小北路一帶的天秀大廈、秀山樓以及三榮大廈等公寓住所，建立起大量由非洲移民群體所組成的公寓居住聚落。為數眾多的非洲移民之日常生活需求與花費，對於小北路一帶以及整個廣州而言皆帶來了可觀的產值與經濟收益。從社會學理論的角度來看，非洲跨境商人在廣州與其母國之間，透過頻繁與密切之跨境商業貿易活動所創造出來之「跨國社會空間」，更被研究者認為是「由下而上之全球化」（globalisation from below）的具體實踐，足見非洲移民對於廣州之城市經濟、整體性發展以及跨國社會與經貿活動等所作出的貢獻<sup>27</sup>。但非洲移民群體在廣州的起居、生活和經濟行為並非完全沒有遇到困難與挑戰，特別是近年來在廣州發生了數起與非洲移民有關的犯罪事件，以及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後大陸社會和廣州市民對於來自非洲國家之移民和商人所展現出來的恐懼情緒愈發明顯。然而，對於非洲移民之不友善的態度與氛圍並非僅導因於新冠疫情，事實上，已有許多黨政人物公開地表達他們對於大量非洲移民居住在大陸和廣州的不安情緒與反對立場<sup>28</sup>。例如，2017年時任政協委員的潘慶林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sup>29</sup>：

黑人兄弟們經常成群結隊，往往夜間出沒街頭、夜總會、偏僻地區。販毒、騷擾女性、打架滋事嚴重擾亂廣州市治安。……非洲是全球艾滋病、埃博拉病毒最猖獗的地區……而來華的所有的黑人入境時沒有申報健康證明，成為巨大隱患。……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非洲黑人非法移民已達70萬，若不採取法律法規嚴加控制，……中國將從民族國家變成移民國家，從黃種人基因國家變黑黃混血人國家。

上述充滿着直接和明確種族歧視的政治語言與論述，顯示出部分黨政人物對於高速增加之非洲移民人口的擔憂，而這樣的社會氛圍也進一步使得愈來愈多非洲移民認為廣州不再是他們留在大陸打拼的最佳地點，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發生後，有更多非洲移民離開廣州，當中許多人選擇的下一個落腳處為浙江省的義烏，在此情況下，廣州「巧克力城」的發展已出現了瓶頸並逐漸褪去了其原本的光環<sup>⑩</sup>。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內部之移民人口所帶來的治理與多樣性議題有所差異，從對上海與廣州的分析可知，由於上海的國際移民群體大多是來自於普遍認為之已開發/發達地區（歐美、日韓等地），且他們主要從事之行業也是具備較高社經地位和附加價值的產業，因此在上海並未出現如廣州那樣具有排外和歧視性質的言論，而上海對於國際移民群體所持的開放與歡迎態度，在某種意義上也加深了歐美移民群體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白人優越性/特權（white privilege）的理論觀點<sup>⑪</sup>。相對之下，廣州市政府在面對移民治理議題時，則有較大的可能受到上述對於非洲移民群體的刻板印象甚至歧視性語言的影響，進而採取較嚴厲和直接的管控措施。由此可見，上海與廣州在移民治理上採取了不一樣的觀點和措施，而上海與廣州間治理經驗的差異，也呼應了本文觀點，亦即若僅將移民治理議題放置在國家的層次來加以理解，那麼將無法了解其多樣性、複雜性和動態性；相反，若將研究與檢視的視角放置在地方面治理經驗的比較，其將有助於拓展研究視野，增進對於地方經驗之差異性與多樣性的了解。

## 五 台灣國際移民治理簡述

除了中國大陸的城市治理經驗外，筆者也欲從地方的角度來檢視台灣不同城市之移民人口結構的差異，以及由於人口差異所帶來之多樣性議題如何進一步地影響台灣城市在相關議題的治理經驗。根據台灣政府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截至2022年3月底，長期居留和居住在台灣的移民人口數為571,201人，佔台灣人口總數約2.4%<sup>⑫</sup>。值得指出的是，在這57萬的外籍人口中有65.22%是來自於大陸或港澳等地區之配偶，其中大陸配偶佔61.7%，而港澳配偶則佔3.52%。由此可見，當前長期居住在台灣的移民人口當中，大陸之移民群體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在其餘的外籍人口當中，19.52%來自於越南，而第三大的外籍移民群體來自印尼，佔比約5.45%，接着是菲律賓移民群體佔1.84%、泰國1.67%、日本1%、柬埔寨0.76%、韓國0.37%，而並非來自上述國家或地區之移民群體則佔約4.17%。以全台灣外籍人口總數計，來自於東南亞國家之移民人口約佔24%。

首先，從地方的角度來看，國際移民居住在台灣的分布情形並不平均，上述七成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台灣主要的六大城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與高雄市，以下簡稱「六都」），而在這六都當中，外籍移民人口數第一名的是新北，其次是高雄、台北、桃園、台中以及台南。另外，在非六都地

區當中，彰化縣所擁有的移民人口數最多，錄得24,254人，而除了彰化以外，其他非六都地區之縣市的外籍移民人口數都低於2萬人，其中宜蘭縣、台東縣、花蓮縣、澎湖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與連江縣等更是少於1萬人。而若將六都與彰化的外籍人口數相加，其所佔外籍人口數的比例將上升至74.32%。

其次，若從國籍與外籍人口結構的組成在台灣不同城市的分布情形來看，越南移民群體的人口分布較為平均，其無論是在新北、桃園、台中與高雄都擁有超過1萬人以上之移民群體，其中新北有19,577人，佔整體越南移民人口總數的17.56%。印尼籍的移民人口方面，居住在桃園者最多，此外在新北、台中、高雄和新竹都各自擁有超過2,000人以上之移民群體。泰國移民方面，其中有約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桃園，而另一個較為集中的城市則為新北，兩者合共佔泰國移民人口總數的44.88%。菲律賓的移民群體則主要居住在新北、桃園、台中與高雄，佔菲律賓移民人口數54.8%。而日本、韓國和港澳移民均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台北與新北兩個城市，分別佔52.13%、51.69%和54.1%。

再次，從移民群體在台灣不同縣市的人口分布情形可知，新北、桃園、台中與高雄擁有之外籍人口數較多且組成結構多元，日本、韓國與港澳之移民人口則集中在台北和新北。值得一提的是，桃園所擁有之印尼、泰國與菲律賓的移民人口數皆高居全台各縣市之首，而上述三個東南亞移民群體在桃園的集中化現象，可能與桃園長期以來擁有的泰國與菲律賓移工人口比例最高有關<sup>③</sup>。換句話說，由於泰國與菲律賓移工群體在桃園擁有人口結構上的優勢，從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的觀點來看，這也促使了泰國與菲律賓移工 (以及同樣來自於東南亞的新興印尼籍移民群體) 在選擇居住地點時會優先考慮桃園，而當中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即是當地所擁有之族裔社群網絡 (ethnic networks) 的規模，因為一地或一城之族裔社群網絡規模大小，會很大程度地影響個別移民或群體在重新安置他們的生活後，進一步獲取相關資源與社會資本之可能性與機會<sup>④</sup>。順此可知，從社會網絡的角度來看，因為印尼、泰國與菲律賓的移民有較大機會在桃園獲得相關族裔社群網絡的資源協助，使得這三個移民群體居住在桃園的人數皆高於台灣其他城市。

除了上述的人口分布差異外，針對台灣各縣市在移民治理議題之制度化程度的差異，筆者欲進行初步的梳理與比較，而對於制度化程度的評估，則是以該縣市有否成立專責處理移民之事務性委員會來作為判別標準。從表2可知，在台灣共計二十二個縣市當中，有十一個縣市設立了跨局(處)之縣市政府層級的新移(住)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且除了台北的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副市長兼任、彰化之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縣政府之秘書長兼任以外，其他九個縣市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或召集人都是由縣市首長親自兼任，以統籌相關事務與擬訂該縣市之移民政策方向。由此可知，在這十一個縣市中，委員會的性質和縣市首長的重視程度依舊有所差異。而台灣還有半數縣市尚未設立委員會，在這半數縣市當中，移民的相關事務與議題主要都是透過社會局(處)轄下或委外辦理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來協助辦理與推動相關之政策執行工作；除了社會局(處)以外，民政局(處)是另外一個涉及移民事務的縣市政府機構。而台灣各縣市是否設置委員會，不僅呈現了當前各縣市在移民治理議題上之制



度化程度的不同，一個合理的想像是，尚未設立跨局(處)之委員會的縣市，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成本來協商與溝通不同局(處)、政府與民間之公私部門間，對於如何推動與執行移民等相關政策之立場與觀點。

表2 台灣二十二個縣市移民治理機制與制度化程度

類型	縣市	運作機制	制度化程度
一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基隆市、嘉義市、彰化縣、屏東縣、宜蘭縣、金門縣	已於地方政府內成立了新移(住)民事務委員會，並由縣市首長或副首長擔任委員會之召集人或負責人；而其他與移民治理相關的局(處)亦須派員參加會議。	較高
二	台南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連江縣	相關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是透過縣市政府之社政和民政單位來負責，而其他局(處)亦參與和承擔了部分與移民相關的治理業務。	較低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台灣各縣市政府及新移(住)民事務委員會的檔案資料。

## 六 結論與討論

綜合上述討論可知，若將檢視移民治理議題的觀點從國家層次下放到地方層次時，事實上，地方在治理移民人口與其所帶來之多樣性議題時，並非全然採取了一致性的作為。不同地方在治理移民時不僅沒有聚合成單一模式；相反，即便是在一個國家境內的不同地方，彼此所選擇和採取的移民治理機制、相關治理過程之制度化安排程度等，都存在着差異性與多樣性。而從筆者對兩岸城市治理的經驗初探可知，上海與廣州以及台灣二十二個縣市在治理移民時，其地方政府都具備自己的能動性，亦即它們並非僅僅只扮演著執行中央政府之移民政策的角色，而是擁有空間與自主性來依照自身移民人口的結構與社會環境脈絡，去選擇不同的治理機制和推動相關的制度化安排。對此，本文同意並呼應了近年移民研究中之地方轉向的觀點，認為從地方的角度檢視移民治理之案例與議題，將可了解和發現更多元的地方移民治理實踐與經驗。

從本文的梳理可知，當前數個傳統和主流理論在解釋移民現象與治理經驗時過於強調中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但這樣的研究途徑不僅可能會因為方法論民族主義所產生的限制，從而忽略了中央政府等宏觀層級以外之行動者在移民治理過程中的作用；且相關的理論對於移民人口如何進一步促使不同地方經歷多樣化和複雜化的過程與經驗也缺乏有效的理解途徑。然而，歐美國家中許多城市正經歷少數為多數和超級多樣性的發展歷程，在在提醒研究者不可忽略地方這一層級在移民治理中的關鍵性；特別是地方政府相較於中央政府而言，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壓力去直接面對與回應不同移民群體在

日常生活中對於公共服務提供的多樣性需求。且當一地或一城接納了愈來愈多的移民人口後，移民群體所集結起來的力量亦有可能會進一步在地方層級上推動政策與制度的創新和變遷。

相關文獻與討論已顯示地方層級之政府部門和行動者在移民治理上並非僅單純地扮演被動和配合中央政府的角色，而不同的地方會在其所面臨的移民人口結構、歷史背景與環境脈絡等條件有所差異的情況下，選擇不同的移民治理模式以及看待移民議題的立場與態度。相關的研究也顯示，當前全球並未有一個普世性或單一性的城市移民治理模式，不同地方所採取的治理模式是多樣的，且同一個城市的治理形式亦有可能會隨着環境的改變與時間的變遷而有所不同<sup>⑤</sup>。本文初探了包括兩岸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上的角色以及相關治理機制的制度化程度，希望拋磚引玉，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能夠從亞洲（特別是東亞）國家之不同城市的移民治理經驗出發，探討亞洲城市在移民治理實踐上的經驗和多樣性，並藉此補足當前城市移民治理研究大多集中在歐美城市的不足；同時亦透過亞洲與歐美城市治理經驗的比較，探索兩者在移民治理經驗與實踐上是否有所差異，藉此拓展相關研究與討論的廣度、深度與多樣性程度。

#### 註釋

① David M. Reimers, "Post-World War II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s Latest Newcomer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54, no. 1 (1981): 1-12.

② Everett S.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 no. 1 (1966): 47-57; Klaus F. Zimmermann, "European Migration: Push and Pull",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 no. 1-2 (1996): 95-128; Francesco Castelli, "Drivers of Migration: Why Do People Move?", *Journal of Travel Medicine* 25, no. 1 (2018): 1-7.

③ 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no. 6 (1928): 881-93;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84-114; Shuang Liu, *Identity, Hybridity and Cultural Home: Chinese Migrants and Diaspora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17-36.

④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no. 2 (1999): 217-37; Thomas Faist,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8, no. 13 (2015): 2271-74; Miriam Tedeschi, Ekaterina Vorobeva, and Jussi S. Jauhiainen, "Transnationalism: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Perspectives", *GeoJournal* 87, no. 2 (2022): 603-19.

⑤ Andreas Wimmer and Nina G. Schiller,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 no. 4 (2002): 301-34; Riyadh A. Shahjahan and Adrianna J. Kezar, "Beyond the 'National Container': Addressing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42, no. 1 (2013): 20-29; Bridge Anderson, "New Directions in Migration Studies: Towards Methodological De-nationalism",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7, no. 1 (2019): 1-13.

- ⑥ Michael Alexander, "Local Policies toward Migrants as an Expression of Host-stranger Relations: A Proposed Typolog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9, no. 3 (2003): 411-30; Rinus Penninx et al., "Introduction: European Cities and Their New Residents", in *Citizenship in European Cities: Immigrants, Local Politics, and Integration Policie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4), 3-17; Maren Borkert and Tiziana Caponio, introduction to *The Local Dimension of Migration Policymaking*, ed. Tiziana Caponio and Maren Borker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9-32.
- ⑦ Nick Amies, "New Study Shows Three Quarters of Brussels Residents Have Foreign Roots" (14 January 2021), [www.thebulletin.be/new-study-shows-three-quarters-brussels-residents-have-foreign-roots](http://www.thebulletin.be/new-study-shows-three-quarters-brussels-residents-have-foreign-roots); 林顯明：〈歐洲超級多樣性(Super-Diversity)之理論概念與研究啟示〉·《人口學刊》·第57期(2018年12月)·頁89。
- ⑧⑨ Ico Maly, "Detecting Social Changes in Times of Superdiversity: An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 of Ostend in Belgiu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2, no. 5 (2016): 708, 711; 711-12, 704.
- ⑩ Burak Pak and Bruno Meeus, "Project Arrivée: Counter-mapping Superdiversity in Brussels and Ghent with Architecture Students", in *Real Time: Extending the Reach of Computation*, vol. 1, ed. Bob Martens et al. (Vienna: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U Wien, 2015), 369-78.
- ⑪ Robert C. Kloosterman, "Migrant Entrepreneurs and Cities; New Opportunities, Newcomers, New Issue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Governance of Migration and Diversity in Cities*, ed. Tiziana Caponio, Peter Scholten, and Ricard Zapata-Barrero (London: Routledge, 2018), 63-74.
- ⑫ Jens M. Krogstad, "Reflecting a Demographic Shift, 109 U.S. Counties Have Become Majority Nonwhite since 2000" (21 August 2019),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8/21/u-s-counties-majority-nonwhite](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8/21/u-s-counties-majority-nonwhite).
- ⑬ Maurice Crul, "Super-diversity vs. Assimilation: How Complex Diversity in Majority-Minority Cities Challenges the Assumptions of Assimil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2, no. 1 (2016): 54-68.
- ⑭ 下述沃托維克的「超級多樣性」概念·參見 Steven Vertovec, "Super-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0, no. 6 (2007): 1024-54; "Introduction: Depicting Diversity", *Diversities* 12, no. 1 (2010): 1-3; "'Diversity'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3, no. 3 (2012): 287-312; "Talking around Super-divers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2, no. 1 (2019): 125-39; Steven Vertovec and Fran Meissner, "Comparing Superdivers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8, no. 4 (2015): 541-55。另可參見林顯明：〈歐洲超級多樣性(Super-Diversity)之理論概念與研究啟示〉·頁79-123。
- ⑮ 以下內容參見 Dirk Gebhardt, "When the State Takes over: Civic Integration Programmes and the Role of Cities in Immigrant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2, no. 5 (2016): 742-58。
- ⑯ Rinus Penninx, "Decentralizing Integration Policies: Managing Migration in Cities, Regions and Localities" (November 2009), [http://integratingcities2012.eu/documents/\(2009%20-%20Penninx\)%20Decentralising%20integration%20policies.pdf](http://integratingcities2012.eu/documents/(2009%20-%20Penninx)%20Decentralising%20integration%20policies.pdf).
- ⑰ Mark E. Spiecka., "City Policy and Guest Workers in Stuttgart, 1955-1973", *German History* 31, no. 3 (2013): 345-65.
- ⑱ Felicitas Hillmann and Ching Lin Pang, "Migration-led Regeneration: On How Cities Become More Unequal with Mixed Population Flows",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2, no. 1 (2020): i-xii.
- ⑲ Ilona van Breugel, "Towards a Typology of Local Migration Diversity Policies",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8, no. 1 (2020): 1-16.
- ⑳ Ilona van Breugel and Peter Scholten, "Mainstreaming in Response to Superdiversity? The Governance of Migration-Related Diversity in France, The

UK and the Netherlands”, in *Superdiversity, Policy and Governance in Europe: Multi-scalar Perspectives*, ed. Jenny Phillimore, Nando Sigona, and Katherine Tonkiss (Bristol: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20), 29-49.

⑳ Frank N. Pieke, “How Immigration Is Shaping Chinese Society” (27 November 2019), <https://merics.org/en/report/how-immigration-shaping-chinese-society> ;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八號)——接受普查登記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情況〉(2021年5月1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 [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4.html)。

㉑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28-34,註6-9、67。

㉒ 陳明昆、李俊麗、章劍坡:〈中國對非教育援助與合作的發展階段、成效和意義〉,《非洲研究》,2016年第1期,頁154。

㉓ Li Anshan,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Research, Reality, and Reflection”,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17, no. 4 (2018): 5-44 ; 〈非洲人在廣州:外貿大學裏的非洲留學生〉(2012年10月31日),中國新聞網, [www.chinanews.com.cn/hwjy/2012/10-31/4289460.shtml](http://www.chinanews.com.cn/hwjy/2012/10-31/4289460.shtml)。

㉔ Jenni Marsh, “Covid-19 Drove Hundreds of Africans out of Guangzhou. A Generation of Mixed-race Children Is Their Legacy” (18 March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17/china/africans-guangzhou-hnk-dst-intl/index.html>; Zhigang Li et al., “Ethnic Enclave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Xiaobei”, <http://curs.hkbu.edu.hk/Abstracts%20and%20Fullpapers/05/07.doc>.

㉕ Zhigang Li et al., “Ethnic Enclave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Guangzhou”, 13.

㉖ Joanna Chiu, “China Has an Irrational Fear of a ‘Black Invasion’ Bringing Drugs, Crime, and Interracial Marriage” (30 March 2017), [www.qz.com/945053/china-has-an-irrational-fear-of-a-black-invasion-bringing-drugs-crime-and-interracial-marriage](http://www.qz.com/945053/china-has-an-irrational-fear-of-a-black-invasion-bringing-drugs-crime-and-interracial-marriage).

㉗ 〈潘慶林:從嚴從速全力以赴解決廣東省非洲黑人群居的問題〉(2017年3月3日),文匯快訊網, <http://news.wenweipo.com/2017/03/03/IN1703030063.htm>。

㉘ “China: Covid-19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fricans — Forced Quarantines, Evictions, Refused Services in Guangzhou” (5 May 2020), [www.hrw.org/news/2020/05/05/china-covid-19-discrimination-against-africans](http://www.hrw.org/news/2020/05/05/china-covid-19-discrimination-against-africans).

㉙ Aldina Camenisch, “Middling Whiteness: The Shifting Positionalities of Europeans in China”, *Ethnicities* 22, no. 1 (2022): 128-45.

㉚ 以下統計數據參見〈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按證件分〉(2022年3月),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www.immigration.gov.tw/media/78566/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按證件分11103.xlsx](http://www.immigration.gov.tw/media/78566/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按證件分11103.xlsx)。

㉛ 彭政添、Asuka Lee:〈用數字看東南亞新移民(上):你知道台灣客家鄉鎮和印尼新移民的關聯嗎?〉(2019年3月7日),關鍵評論網,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4252](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4252); 〈用數字看東南亞新移民(下):他們都靠婚姻仲介來台?錯,自由戀愛也不少〉(2019年3月8日),關鍵評論網,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4478](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4478)。

㉜ Carl L. Bankston, *Immigrant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15-40.

㉝ Tiziana Caponio, Peter Scholten, and Ricard Zapata-Barrero, introduction to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Governance of Migration and Diversity in Cities*, 1-8; Robert Barbarino, Charlotte Räuchle, and Wolfgang Scholz, “Migration-le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6, no. 2 (2021): 1-6.